

# 中国佛教思想史

郭朋 著

(下卷)

本书论述了佛教自西汉之际传入中国，历经隋唐，直至明清，在漫长的历程中，佛教在完成其自身的发展、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同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交涉，作为外来的宗教，终于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宗教。在思想领域，佛教与儒、道两家既相互矛盾、斗争，又相互吸收、融合，自然产生了“三教一家”、“三教同源”的思想，这种“三教一家”思想的出现，乃是历史的要求，时代的需要。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# 中国佛教思想史

郭朋 著

(下卷)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佛教思想史：全3卷 / 郭朋著. —北京：社  
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2.8  
ISBN 978-7-5097-2960-1

I. ①中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佛教史：思想史—研究  
—中国 IV. ①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4540 号

## 中国佛教思想史 (上、中、下卷)

著 者 / 郭 朋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出 版 者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

邮政编码 / 100029

责任部门 / 国际出版分社 (010) 59367197

责任编辑 / 赵子光

电子信箱 / guoji@ssap.cn

责任校对 / 宋建勋 贾迎亮 张延书 孔 勇

项目统筹 / 李延玲

责任印制 / 岳 阳

经 销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89

读者服务 / 读者服务中心 (010) 59367028

印 装 /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/ 99.25

版 次 /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
字 数 / 1607 千字

印 次 /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097-2960-1

定 价 / 298.00 元 (上、中、下卷)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

▲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下卷目录

## 上编 宋元佛教思想

第一章 宋代佛教思想	3
第一节 概述	3
第二节 宋代译经(附刻经)	8
第三节 宋代度牒	14
第四节 宋代禅宗	20
一 宋代禅宗的《灯录》和《语录》	20
二 宋代禅宗的两个支派	27
三 宋代禅宗与程朱理学	54
第五节 宋代天台宗	75
一 宋代天台宗的文献	76
二 宋代天台宗的师承	78
三 知礼、遵式与悟恩	81
四 宋代天台宗的“山家”与“山外”之争	97
第六节 宋代佛教的其他各宗	100
一 宋代净土宗	100
二 宋代华严宗	104
三 宋代唯识宗	116
四 宋代律宗	116
第七节 延寿与赞宁	118
一 延寿	118
二 赞宁	126
第八节 契嵩与智圆	130
一 契嵩	130
二 智圆	141

## 2 中国佛教思想史(下卷)

<b>第二章 元代佛教思想</b> .....	146
第一节 元代崇佛 .....	146
第二节 帝师制度 .....	151
第三节 汉地佛教简况 .....	158

### 中编 明代佛教思想

<b>第三章 明王朝与佛教</b> .....	169
第一节 概述 .....	169
第二节 明太祖与佛教 .....	172
一 小和尚出身的明太祖 .....	172
二 明太祖对佛教的利用 .....	175
第三节 明成祖与佛教 .....	182
第四节 明武宗与佛教 .....	191
<b>第四章 明代佛教思想</b> .....	196
第一节 概述 .....	196
第二节 明代佛教诸宗 .....	199
一 禅宗 .....	199
二 其他各宗 .....	291
第三节 明代佛教四大家 .....	302
一 株宏 .....	302
二 真可 .....	313
三 德清 .....	334
四 智旭 .....	368

### 下编 清代佛教思想

<b>第五章 清王朝与佛教</b> .....	395
第一节 概述 .....	395
第二节 清初诸帝与佛教 .....	399
一 顺、康、乾三帝与佛教 .....	399
二 以超等“宗师”自居的雍正帝与佛教 .....	403

第六章 清代佛教思想	417
第一节 概述	417
第二节 清初佛教的两新贵——通琇与道忞	419
一 通琇	419
二 道忞	424
第三节 清代佛教各宗简况	428
一 禅宗	428
二 净土宗	429
三 天台宗	430
四 贤首宗	431
五 唯识宗	431
六 律宗	432

## 上编 宋元佛教思想



# 第一章 宋代佛教思想

## 第一节 概述

立国三百一十九年的赵宋王朝，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屈辱的一个王朝。从开国到灭亡，它始终处于少数民族贵族统治势力的胁迫之下。始而辽、（西）夏，继而金、（蒙）元，都对它虎视眈眈。北宋王朝，最终亡于金；偏居一隅苟且偷安的南宋王朝，最终亡于元。在这三百多年中，赵宋王朝，始终不曾真正地扬眉吐气过。这么一个屈辱的王朝，耗费却很浩繁。因为除了它本身的需要外，每年还得拿出大量的金银、锦帛，作为“岁贡”，小心翼翼地奉献给少数民族的统治者。<sup>①</sup>这种额外的财政负担，必然要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，必然要加重对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。<sup>②</sup>这样，势必又要加剧封建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，导致更加尖锐的阶级矛盾。有宋一代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，便是这种情况的历史反映。外部的少数民族贵族压迫和内部的阶级斗争，都与赵宋王朝相始终。其处境之艰难，可以想见。

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，除了强化国家机器之外，还必须利用思想统治的工具，在这方面，除了儒、道两家，便是佛教了。因为，只有佛教，才有可能给灾难深重的广大劳动群众以“精神慰藉”（实是精神麻醉），把劳动群众的愁思，从苦难的现实，引向虚无缥缈的“无有众苦，但受

① 根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和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等史书记载，北宋在“澶渊之盟”以后，每年向辽输纳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；庆历以后，增为每年纳银二十万两，绢三十万匹。南宋绍兴年间，每年向金贡银二十五万两，绢二十五万匹。以后所纳，有增无已。

② 以真宗、仁宗两朝的赋税为例，即可说明这一点。真宗景德年间，每年赋税收入，总额为四千九百一十六万九千九百石、缗。而当时人口，为七百二十二万多户，耕地（天禧五年）为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。仁宗皇祐年间，税收总额在景德年间的基数上，每年又增收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石、缗。而当时的垦田数为二百二十八万多顷（全部耕地面积，当然要大于此数），人口（嘉祐八年）为一千二百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一十一户。（以上数字，分别见于《宋史·地理志一》、《宋史·食货志上一·农田》、《宋史·食货志上二·方田赋税》以及《文献通考》卷四《田赋》等史料。）

诸乐”的彼岸世界，从而使此岸的苦难世界能够保持表面的平静，宋王朝的封建统治也因此能够得到短暂的维持。就北宋来说（南宋各帝，从赵氏不肖、民族败类的赵构起，甘心媚外事敌，苟活偷生，无足论者），除了徽宗表演了一场佛教“道化”的闹剧、钦宗为时短暂姑置勿论外，其余七帝（即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），对佛教都是采取扶持、利用的政策。

宋太祖赵匡胤，不但经常参拜佛寺，而且还派遣大批僧人出国留学。据《宋史·太祖纪》记载，乾德四年（966），派遣僧人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“游西域”，每人赐钱三万。这不但在佛教史上，而且在中国历史上，恐怕也是官派留学生最早、最多的一次。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《开宝藏》（初刻成时共五千多卷，后续有增刻，最后达到六百五十多帙，六千六百多卷），便是从开宝四年（971）起刻的。开宝年间，重修同州（今陕西大荔县）龙兴寺舍利塔，耗费百万。<sup>①</sup>据佛教史料的记载，宋太祖还经常读诵他自己书写的《金刚经》。一天，他正在读经，被忽然进来奏事的宰相赵普看见了，他就对赵普说：“这件事可别让那些武将们知道，要是他们问起我平时看些什么书，你就告诉他们我‘常读兵书’”<sup>②</sup>。自己读佛经，却怕别人知道，堂堂皇帝，竟然如此！此外，他还“倾心崇建”佛菩萨像<sup>③</sup>。

宋太宗赵炅，更是“素崇尚释教”<sup>④</sup>。他常去寺院参礼，热心于一般的佛事，还模仿唐代，创建规模宏伟的译经院，派遣朝廷大员充任译经使、润文官，组织印度来华僧人（以及某些汉籍僧人）从事佛经的翻译。他还效法唐太宗，撰写了《新译三藏圣教序》，宣扬：“大矣哉，我佛之教也。……广博宏辩，英彦莫能究其旨；精微妙说，庸愚岂能度其源。”（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一八）这篇序文，不但笔之于书，而且刻之于碑<sup>⑤</sup>。他还敕令在开宝寺内建造一座十一级、三百六十尺高的舍利塔，历时八

① 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二五《重修龙兴寺东塔记》。

② 《佛祖统纪》卷四三记载：“上自洛阳回京师，手书《金刚经》，常自读诵。宰相赵普，因奏事，见之。上曰：‘不欲甲冑之士知之，但言常读兵书可也。’”

③ 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二三《正定府龙兴寺铜像记》记载：“……至开宝四年七月二十日，下手修铸大悲菩萨，诸节度、军州差取到下军三千人工役。”“足至头顶，举高七十三尺。”“所有四十二臂，并是铸铜筒子。”“……帝乃倾心崇建，四众愚切归依。”

④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三称：“……（太平兴国五年，980）法天闻天息灾等至，亦归京师。上素崇尚释教，即召见天息灾等，令阅太祖乾德以来西域所献梵经。”

⑤ 据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二五记载：碑于太宗端拱元年（988）十月建成于西安府，高六尺八寸，广四尺五寸，二十行，行四十字，隶书，篆额。

年，“所费亿万计”（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一五）。塔建成后，他亲自安放舍利。“上雨涕，都人万众皆洒泣；燃指，焚香于臂掌者无数。内侍数十人，愿出家扫洒塔下，悉度为僧。”（《皇朝类苑》卷四三）他尝对人说：“朕曩世尝亲佛座。”（同上）表示他也是佛子再世。他还宣称：“浮屠氏之教，有裨政治。……朕于此道，微究宗旨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三）“朕方隆教法，用福邦家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·道释一》）他的儿子真宗恭维他“游心释部，观妙真宗，演畅一音……得灵山之密印”（《宋大诏令集》卷二二三《以太宗御制〈妙觉集〉编入佛经大藏诏》）<sup>①</sup>。并诏令把他的“御制《妙觉集》五卷，编入佛经大藏”（同上）。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二五《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并序》里，还有这样的话：“我国家……崇道教，兴佛法。”“今公帑有羨财，国廩有余积，可以营佛事，创梵宫。……”〔这道碑，建于太宗端拱二年（989）初〕据佛教史料记载，从太宗即位，到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，短短的几年间，“凡度一十七万余人”（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一八）。于此可见，自以为国家很富裕的宋太宗，确是在那里大“营佛事”。

宋真宗赵恒，不但常去寺院“祈雨”，而且还去寺院“祈晴”。他近效乃父，远法唐高宗，制作《圣教序》，大力支持译经。咸平至景德年间，朝廷派遣内侍王守真等，发诸州兵一千三百人，重修太原惠明寺舍利塔（塔高一百五十八尺）。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）九月，真宗下诏普度天下童子（每十人度一人）。三年，诏于京师及诸路共设戒坛七十二处：京东四处，京西六处，河北三处，河东五处，淮南九处，江南十四处，两浙十五处，荆湖六处，福建三处，川陕七处。（详见《宋会要辑稿·道释二》）四年，诏赐黄金三千两，增修峨眉山普贤寺，同时斋僧三万人。还曾先后下过《僧尼、道士、童行十人外更放一人诏》（景德三年十一月）和《特度僧道诏》（大中祥符二年正月），宣扬“能仁垂教，盖诱于群迷”（前诏，《宋大诏令集》卷二二三），“冀因善利，永福苍黔”（后诏，同上）。提出要更加广泛地度人出家，以“仰答神休，均雷雨恩”（《特度僧道诏》）。

宋仁宗赵祯，也很“好佛”。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四月，仁宗为驸马都尉李遵勗编纂的《天圣广灯录》作序，说：“……我太祖之乘策也，

<sup>①</sup> 这篇诏文写于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）六月。

王法延乎住世；我太宗之握纪也，妙供满于诸天；真宗皇帝，密契菩提之心，深研善逝之旨……朕嗣景祚，子毓群黎，将以驱福寿之民，居常奉调御之本。……”（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一八）表明自太祖到他，都是热心于佛事的。南宋马永卿曾颂扬：“仁宗皇帝，道德如古帝王，然禅学亦自高远。仆游阿育王山，见皇祐中所赐大觉禅师怀琏御书五十三卷，得偈颂极多，内有一颂，留怀琏住京师，云：‘虚空本无碍，智解来作祟，山即如如体，不落偏中位。’……仰窥见解，实（在）历代祖师之上。宜乎身居九重，道高万物。”（《懒真子》卷二）此话纯属阿谀，从中却可以看出仁宗不但好佛，而且喜禅（虽然所引颂文，并不怎么高明）。

英宗、神宗、哲宗也都把佛教视为可资利用的思想工具而大加提倡。

至于偏安、偷生的南宋王朝，虽然有时对佛教也采取过一些限制措施，但总的说来，却是更加重视扶持、利用佛教以维护其王朝的统治。

由于朝廷有意扶持，宋代佛教寺院的经济力量相当雄厚。寺院占有大量土地，拥有大量房产。据《宋史·食货志上五·役法上》记载，寺院月收房租一万五千石、季收粮食百石以上者，方才缴纳助役钱。寺院的富有，于此可以想见。南宋时，仅福建路，寺院的田产收入，除缴纳两税和供应寺僧需用外，每年尚有盈余三十六万五千多贯（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六一·官田杂录》）。国家残破，而寺院却如此富有。北宋时期，全国约有佛教寺院四万来所，而且大寺院很多。以京师汴梁来说，相国寺凡八禅、二律、六十四院；龙兴寺，凡五百六十二区；资圣院，凡七百二十区；普安禅院，凡六百三十八区。类似这样的大寺院，不但京师有，各地都有。例如，黄州齐安（今湖北黄冈县）的永兴寺，一次重建，即耗费四百七十万（全系富家捐款，其中两家就捐出三百五十万），其寺院规模之大，于此可见。（详见王禹偁《小畜集》卷一七《黄州齐安永兴禅院记》）寺院如此富有，出家者自然就多了。家庭富有、买得起度牒的，自然可做正式僧人，而家境贫苦、无力购买度牒者，为了逃避徭役，也多“窜名浮图籍，号为出家”（《宋史·食货志上五·役法上》）。因此，宋代僧尼为数颇多，以下数字，足资证明：

年代	户口 <sup>①</sup>	僧尼
真宗（天禧五年）	六百三万九千三百三十一（户）	四十五万八千八百五十四人
仁宗 <sup>②</sup>	二千六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一（口）	四十三万四千二百六十二人
神宗（熙宁十年）	三千八十万七千二百一十一（口） <sup>③</sup>	二十三万二千五百六十四人 <sup>④</sup>

神宗时，户口上升，僧尼数减（如此锐减，可能不确），这倒是一种好现象。而到了南宋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），竟然还有僧尼二十万人（绍兴二十九年〔1159〕时，仅有人口一千六百八十四万二千二百零一人），数字实在惊人。僧尼人数的众多，也反映出当时社会苦难的深重。不少知识分子，面对时艰，无可奈何，只有逃入佛门，以图一时的苟安；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劳动群众，哭诉无门，也只有纷纷“窜名僧籍”，以求一时的荫蔽。同时，还有一些不逞之徒，也混迹寺院，假冒僧徒。《宋会要辑稿·道释一》所载“游堕凶顽，隐迹为僧，结为盗贼”，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。该书还记载：仁宗天圣四年（1026）正月，宰臣张知白奏称：“臣任枢密（副使）日，尝断劫盗，有一火（伙）之中，全是僧徒者。”僧人泛滥，于此可见。尽管朝廷设立专门机构（例如祠部、僧录司等）管理寺僧，而且时加“澄革”<sup>⑤</sup>，但仍然防止不了僧人的泛滥。由于社会问题严重，造成僧尼过多；又由于僧尼过多，更增加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。这种互为因果的情况，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。尽管如此，宋王朝还是尽量利用僧人为其统治服务；为了酬偿服务有功者，还经常以“二字师号”（例如“明教大师”——契嵩）、“四字师号”（例如“通慧示相大师”——某僧）、“六字师号”（例如“慈济定明妙应大师”——某僧）以至“八字师号”（例如“圆通应感慈忍灵济大师”——某僧），分别赐予活着的或者已经死去的和尚。据《宋会要辑稿·道释一》记载，宋代僧人获得这种封号的，不下数十人（用高价购买这些称号的，为数也相当多）；而生前“赐紫”，死后受谥的，更是不可胜数。

① 宋代户口最多时达到哲宗绍圣四年（1097）的一千九百四十三万五千五百七十户、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六百零六口和徽宗大观四年（1110）的二千零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户、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口。

② 仁宗时的户口，是嘉祐八年（1063）的数字；僧尼，是景祐元年（1034）的数字。

③ 三朝户口数字，统见《宋史·地理志》。

④ 三朝僧尼数字，统见《宋会要辑稿·道释一》。

⑤ 例如仁宗对上述张知白的上奏批示说：“自今，切宜渐加澄革，勿使滥也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·道释一》）

虽然佛教并没能保佑宋王朝免除灾难，但宋王朝对于佛教还是尽力保护的。佛教给予宋王朝的，只是一种根本不能兑现的虚幻的祝福；而宋王朝给予佛教的，却是完全可资享用的实惠。宋代佛教，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，继续其存在，并且有所发展的。

## 第二节 宋代译经（附刻经）

宋代译经，是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开始的。开宝年间，印僧法天来华；之后，印僧天息灾（后改名法贤）、施护等人，又携带梵本经典，于太平兴国五年（980）相继来华。宋太宗效法唐太宗对玄奘译经事业的大力支持，决意建立宋王朝的译经事业。他先诏令中使郑宋约（约，一作“均”），在太平兴国寺的大殿西边，选择地段，建译经院。译经院正中设译经堂，东序为润文堂，西序为证义堂。译经僧人还分设堂室。七年六月，译经院全部落成，太宗当即诏令法天、天息灾、施护三人进驻译经院，并赐号法天为“传教大师”，天息灾为“明教大师”，施护为“显教大师”。诏令他们各译一经进上。

施护表示，按照佛教规矩，译经之前，要先作道场。光禄卿杨悦将这一意见代为上奏。蒙诏许后，施护便于译经院的“东堂西面，粉布圣坛，坛开四门，梵僧四人，各主其一。持秘密咒七昼夜。又设木坛，作圣贤位，布圣贤字轮，目曰‘大法曼拿’。……香、花、灯、涂、果实、饮食，二时供养；礼拜、旋绕，以殄魔障”（《宋会要辑稿·道释二》）。看来，施护其人，也是密教中人，所以他要在开始译经之前，先按照密教仪式来一番祭祷。参与译经的僧人，还要“每日沐浴，严洁三衣、坐具，威仪整肃”（同上）。他们的全部生活费用，都由朝廷供给。

参与译事的成员，分为如下九类：

第一，译主，当面正坐，前置梵本。

其左：

第二，证义梵僧，与译主评量经义；

第三，证梵文梵僧，听译主朗诵梵本，以验差误。

其右（一说“证义”居左，“证文”居右）：

第四，梵学僧，观看梵本，听译主宣读，书为隶字。

第五，梵学僧，同上笔受；

第六，梵学僧，删缀成文；

第七，证义僧，参详文义；

第八，字梵学僧，刊定文学。

第九，润文官——于僧众南面，别设座位，参详润色。

诏令梵学僧法进、常谨、清沼等担任笔受、缀文，另选义学沙门十人为证义，光禄卿杨悦、兵部员外郎张洎负责润文，殿直刘素为都监。

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十月，天息灾等上奏：迄今翻经，都是梵僧，一旦没有梵僧，译经就将中断；为使译经事业不至中断，希望能选两街童子共五十人，令学梵文，学成之后，从事译经。诏令集京城童幼五百人，从中选拔；结果选得惟净等五十人，送译经院学习梵文。此后，惟净学通梵文，被度出家，并赐号“光梵大师”，成为宋代知名的华籍译师。就在这一年，改译经院为传法院。

雍熙元年（984）九月，太宗下诏：从今以后，新译经论，并刊板摹印，以广流布。

雍熙二年，太宗看了新译佛经，表示满意，遂诏封天息灾、法天、施护并为朝散大夫，试鸿胪卿。

雍熙三年十月，太宗御制一篇《新译三藏圣教序》，以冠诸经首，并令刊石于御书院。

雍熙四年，诏天息灾改名法贤。

淳化五年（994），诏所译经，并写两本：一藏本院，一入大藏。

咸平二年（999），真宗御制一篇《圣教序》赐传法院，并也刻石于御书院（组织译经，制作序文，看来宋太宗父子，都在刻意效法唐太宗父子）。

天禧四年（1020）起，朝廷又派遣中枢大员充任译经使、润文官。从真宗天禧四年到仁宗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先后充任这种职务的，计有：宰相丁谓、王钦若、吕夷简、章得象、文彦博，参知政事宋绶，翰林学士晁迥、李维、夏竦、杨亿等人。

仁宗景祐二年（1035），刑部尚书夏竦，奉诏撰写《传法院译经碑铭》，诏刊于石。

庆历三年（1043）十月，赐传法院寺务司钱，每年五十万。

庆历五年正月，命宰相章得象撰写《〈御制传法院译经碑〉后记》。

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到仁宗景祐二年（1035）五十四年间，共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夹，译出经论五百六十四卷。此后虽续有翻译，但为数不多。神宗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废译经（传法）院；元丰五年（1082），罢译经使、润文官，废“译经使司印”。至此，宋代译经就算基本结束了。

元丰以前，译经僧多半授予试光禄卿、鸿胪卿、鸿胪少卿等官衔。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有司建议：译经僧试卿者，改赐“译经三藏大法师”；少卿者，改赐“译经三藏法师”。神宗下诏：试卿者，赐“六字”号（即在“法师”前再加四字）；试少卿者，赐“四字”号（“法师”前加二字），并冠以“译经三藏”字样。其余（如俸给等），一仍旧制。

在宋代译师中，较知名的，要算是天息灾（法贤）、法天、施护了。仅就他们翻译的密教经典（宋代译经，主要都是密教经典）来说，天息灾译出的，共二十五部，四十五卷，部头在三卷以上的有：

《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》<sup>①</sup>七卷

《一切如来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拿罗经》五卷

《佛说瑜伽大教王经》五卷

《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》四卷

《佛说最上秘密那拿天经》三卷

《佛说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经》三卷

其余都是一卷一部的小部头经。

施护译出的，共三十部，七十七卷，部头在三卷以上的有：

《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》三十卷

《佛说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》七卷

《佛说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》六卷

《佛说秘密三昧大教王经》四卷

《佛说秘密相经》三卷<sup>②</sup>

① 吕澂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经录》）著录“《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》七卷”。另还著录“《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》二十卷”。

② 吕著《经录》还著录有“《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》五卷”。

其余都是一、二卷（只有两部）一部的小部头经。

在法天译出的九部、十三卷的经典中，只有《妙臂菩萨所问经》是四卷本，其余八部，一卷的六部，二卷的二部。

印籍译师，除上述三人，还有一些人（例如两个法护以及日称、智吉祥、天吉祥等），但是，这些人的译经数量都很少，影响远比上述三人小得多。华籍译师中，只有从传法院培养出来的惟净有一些成就。早在乾德四年（966）就派出了行勤等一百五十七名僧人赴西域学法、取经（每人赐钱三万），但是，以后没有听说他们当中有谁学有成就，也没有听说他们当中有谁在回来之后能够参与译事。这批最早的官派留学生，成就却是最小的。

北宋时期，印度佛教已经到了晚期，当时在印度流行的主要是佛梵混合、宗教变种的密教。所以，宋代的译经也多半是密教经典。在这些经典里，不少论点是同儒家的伦理观念相抵触的。而当时充任译经使、润文官的，又都是一些儒家学者，所以，有些经典才被译出，即被毁禁。例如，有一部《大乘秘藏经》（二卷），淳化五年（994）译出之后，发现有六十五处“文义乖戾”，太宗听说后，当即诏谕：“使邪伪得行，非所以崇正法也。”勒令把这部经“对众焚弃”（《宋会要辑稿·道释二》）。还有一部《频那夜迦经》（四卷），天禧元年（1017）译出后，发现也有问题，真宗特下诏书说：“金仙垂教，实利于含生；贝叶誊文，是资于传译。苟师承之或异，必邪正以相参，既失精详，寔成讹谬。而况荤血之祀，颇渎于真乘；厌诅之词，尤乖于妙理。方增崇尚，特示发明。其新译《频那夜迦经》四卷，不得编入藏目；自今传法院似此经文，无得翻译。”（同上。另见《宋大诏令集》卷二二三）大概在这部经里鼓吹了“荤血之祀”和“厌诅之词”，所以遭到反对。其实，密教经典差不多都含有这类内容，只不过这部经宣扬的可能过于露骨罢了。

正是由于宋代译经多半都是属于密教经典，讲“义理”的并不多（虽然也有一些），所以尽管朝廷为了译经事业耗费了不少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而且确也译出了相当数量的经典，但是，它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影响，却是微乎其微的，无法同以往（特别是唐代）的佛教译经相比拟。

宋代在译经的同时，也编纂《经录》，凡有三家：其一，大中祥符年间，由参知政事赵仁安、翰林学士杨亿等人编纂，大中祥符六